

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纲领性文献

——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

朱 传 荣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之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力量源泉,是筑起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的行动纲领;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明是非、辨方向、增信心、鼓斗志的理论指南。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纲领性文献,又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一)

《讲话》依据唯物史观,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70年斗争历史的极其丰富、极为成功的宝贵经验,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共产党70年斗争的胜利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胜利历史。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指明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人类发展的前景,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是观察处理当代一切复杂问题的最科学的原则和方法。然而,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的产生和发展是植根于社会主义实践之中的,它一刻也不能脱离千百万人民群众及其领导者共产党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具体内容,也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样,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毛泽东同志是我党历史上实现这个结合的奠基者和光辉典范,而结合的结晶,就是毛泽东思想。《讲话》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是实践这种结合的光辉典范。他提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原则,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和党的建设方面所做出的不朽贡献,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的正确思想,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第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历史上坚持、发展和创造性地实践这个结合的杰出代表。《讲话》中明确说明:“邓小平同志是捍卫、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杰出代表。他提出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原则，是集中全党智慧和经验的创造，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最重大的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and 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论述，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关于‘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论述，关于国际战略格局和建立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论述，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第三，中国共产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决心为进一步实现和发展这个结合，奋勇前进，这自然是这个结合发展的第三个历史阶段的新开端。因而，《讲话》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人将永远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去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条原则，就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对这个结合的新发展。《讲话》中关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和“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问题，就是实现这个结合的基本规定和原则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相结合，首要的是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坚定不移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历史的经验一再教育我们，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无产阶级不可能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即使掌握了政权，也会得而复失，这已为众多的事实反复证明。前些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几度泛滥，主要是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放松甚至让出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的结果。因此，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澄清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搞乱了的理论是非，加强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的批判和斗争，是实现这个结合的一个重要前提。其次，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深刻认识我国国情，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是实现这一结合的另一个重要前提，特别是在当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依然严重存在，“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相当尖锐的情况下，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更应下大力气研究和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由此可见，要实现这个结合，必须进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坚决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讲话》对此指出了方向和具体途径。

(二)

《讲话》中关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一节的论述，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原则立场的宣言；是推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健康发展的行动纲领；是对民主社会主义、新机会主义思潮的尖锐批判；是对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坚强回击。因此，要认真学习领会《讲话》的实质精神，不仅要密切联系国内的实际情况，而且还要密切联系复杂的国际情况，特别要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有力的批判和斗争。就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在各种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思潮中，其危害性和蛊惑性最大的莫过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它既是新机会主义效法的模式，又是垄断资本主义反动势力推行和平演变、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得力的帮办。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纲领的基本特征是：在经济上主张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体制，反对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在政治上主张多党制的议会民主制度，反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在思想理论上主张多元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讲话》既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根本要求，又坚定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心。它首先明确提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和发展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动摇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就动摇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了”。经济基础是一定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总和构成的，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着经济基础的性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以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的总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着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性质。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私有经济是从属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补充形式，它不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性质。同样，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体经济，受制于和从属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它的一种补充经济形势，它不决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物质资料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总和，其中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整个经济基础性质的决定因素，它的主体地位是不能动摇的。《讲话》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必须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其他经济成份的适当发展，既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搞单一的公有制，又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能搞私有化；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既要克服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计划的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这既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原则规定，也是区分真假社会主义改革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在当代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既有为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改革，也有为动摇瓦解社会主义制度、导向私有化的“改革”。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改革，其根本分歧就在于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还是搞两极分化；坚持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还是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这三者中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最根本性的基础，“动摇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就动摇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必将损害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商品以经济公有制为基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两者存在本质区别。计划与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和私人经济的存在和适当发展，是由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决定的。但这种存在和发展决不能漫无限制，决不能损害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同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才能有统一的社会利益和雄厚的物质力量，确保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达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目的，才能始终保持全社会强大的凝聚力。

由此可见，是否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科学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一个焦点，也是区分为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改革与资本主义复辟为目的的所谓“改革”的试金石。民主社会主义的鼓吹者，在经济体制上的根本主张，就是坚持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体制”。他们主张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只通过把某些经济部门国有化，再加上实行某些税收制度、福利措施等等来“改善”人民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这又主要是通过现存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实现的。他们主张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实行以生产资料私有化为中心的所谓“改革”，据说这是实现“有效而活跃的经济制度”的根

本前提。这种化公为私的“改革”，无非就是把社会主义“改革”成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而这正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目的。显然，民主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是互相配合的。如果我们不清醒而坚定地反对和抵制它的侵蚀，我们就在实际中顺应了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就会使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流血牺牲争得的胜利成果毁于一旦，使中华民族重新陷于被奴役的地位。《讲话》对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论述，是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图谋的切中要害的一击，也是对国内那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切中要害的一击。

(三)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离不开相应的上层建筑的完善和发展。一般说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决不是说上层建筑是消极、被动的方面，恰恰相反，它对经济基础起着巨大反作用。特别是在上层建筑体系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和经济直接联系的，它并且影响、制约和决定着上层建筑其他部分的方向。因此，任何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十分注意国家政权和思想文化阵地的建设，发展本阶级的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否则不能维持本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利益。工人阶级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与全体人民的利益根本一致，它当然也须巩固和完善自己的上层建筑。

《讲话》明确规定和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削弱和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搞西方那种议会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三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和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实现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体现人民利益的，应该通过法定程序和法律形式，把党的主张变为国家意志，因而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是必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核心力量，没有这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就国际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历史来看，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从分散的、自发的斗争阶段发展到统一的、自觉的斗争阶段的产物。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全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要求和革命性质决定的。在无产阶级整个革命过程中，都始终需要有科学社会主义武装的革命政党的领导。邓小平同志1979年《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①因为，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或者说，无产阶级要形成一个阶级的整体和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统一政党的领导。任何削弱、偏离、分裂共产党的领导，都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破坏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事业的历史错误，这已经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多年的历史所证明了。《讲话》深刻阐明了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坚持和加强共产党的领导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否遵循这一根本原则，是区别坚持社会主义改革与借改革之机推行资本主义化的分水岭。在政治

体制改革中实行的一切改革领导体制的措施，都是为了加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职能，而不是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凡是借口实行“民主化”、“公开化”而鼓吹推行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借口纠正共产党执政过程中的失误，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掀起怀疑和否定共产党领导的逆流的言行，都是对共产主义事业背叛。

对待共产党在领导工作中的失误，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是没有成例可循的崭新的事业，需要几代人在实践中反复进行创造性地探索；取得执政地位的共产党，是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国土中，又是在极端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建设社会主义的，面临的矛盾之多、困难之大、任务之艰巨，都是历史上任何别的阶级没有遇到过的。如果说剥削阶级在建立它们的统治的过程中不知道犯过多少错误，那么有什么理由要求工人阶级的政党在执政过程中不犯任何错误呢？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力量和生命力，不在于它是否犯错误，而在于所犯错误的性质，在于它是否正确对待错误和改正错误。列宁早就说过：“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②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斗争中，在夺得政权以后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斗争中，确实都曾经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我们毕竟把一个受人欺凌宰割的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独立自主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且开辟了向高度繁荣的道路继续迈进的现实道路。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谁能抹煞得了呢？我们党犯的 error，是在把革命建设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征途中的错误，是在为振兴中华的努力奋斗过程中的错误，不但与伟大成就相比，只占次要的地位，而且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所犯的 error 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这是每一个尊重起码事实的人都不应怀疑的。何况我们党历来充分正视、公开揭露和批评这些 error，包括对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 error，并依靠自身的力量努力加以纠正，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在纠正 error 中所表现出来的决心、勇气和严肃的自我批评的精神，以及它对国家、民族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光明磊落、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一切敌对势力破坏、和一切机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完全能够肩负起共产主义历史使命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为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所自豪的。

《讲话》明确指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当代，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引导人们深刻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人们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中驾驶全局，把握世界形势变化的本质，不被历史长河中的旋涡和逆流所迷惑。民主社会主义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宣扬世界观和指导思想上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强调以多元论作为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大特征，就是强调社会主义同其他资产阶级学说，乃至宗教结合的可能性，反对以统一的世界观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社会党国际《法兰克福宣言》称：“社会主义是无论如何也不需要立场严格划一的国际运动，不管社会党人是以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或在其它前提基础上的社会分析来确定自己的信仰，还是以宗教的或人道主义的理论来确定自己的信仰，他们都向往一个目标”。勃兰特则明确地说，多元论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求“放弃追求一种真理，而应当学会跟若干真理共存”。实际上，从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看，中间不管它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它所谓“开放性”是只为新康德主义哲学、波普的“批判唯理论”哲学等资产阶级自由派哲学开放的，而对马

·克思主义,特别是对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则不仅绝对不予开放,并且坚决反对。另外,我们要特别看到,民主社会主义者在指导思想上提出多元化理论对抗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理论,归根结底是他们主张政治多元化的立场决定的。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主张政治多元化,虽能对工人阶级利用它进行合法斗争有一定作用,但其本质作用,是为资产阶级宣扬超阶级的民主、自由,为巩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统治服务的。在社会主义政治改革和文化建设中,如果主张在指导思想上想搞多元化,就必然导致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人阶级队伍内部发生分裂,给国内敌对分子和反动势力提供反社会主义活动的把柄,从而损害全体劳动者和全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这已经不只是理论分析和说明的问题了。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鼓吹“真理多元论”,攻击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其目的就是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企图以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取代马克思主义。他们在思想理论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目的就是要在实践上根本否定社会主义。正如《讲话》指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和斗争,实质是要不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斗争,但这种政治斗争大量地经常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理论斗争。”因此,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就必然成为我们实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的根本任务。不彻底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散布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观点,就等于为敌对势力颠覆社会主义的图谋大开方便之门。

(四)

《讲话》明确指出,实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就是反和平演变。

和平演变战略是在西方帝国主义使用武力消灭不了社会主义,而又不容许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背景下出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在世界广大范围内取得了胜利,这使西方反共势力惊恐万状。他们为把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尽快扼死,提出“非军事遏制”的杜鲁门主义,妄图阻止社会主义影响的扩大,促使社会主义从内部瓦解。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是主张从内部瓦解、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人物,他哀叹美国用武力不能征服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人民,但又不甘心失败,就提出通过扶植“民主个人主义者”从内部推翻人民民主国家的图谋。毛泽东同志对此作了尖锐批判,指出艾奇逊的《白皮书》是美国政府“无可奈何的自供状”,是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的自白,揭露了美国反动派不仅要从外部继续压迫我们,还企图从内部颠覆我们。1953年就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第一个明确提出“和平演变”战略的所谓“解放政策”,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演变上。他恶毒地攻击说:“中国共产主义是一个致命的危险”,“是一种要消逝的现象”,他明目张胆地宣称,美国及其盟国的责任,就是要“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③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虽然有起伏,具体说法也有变化,但是颠覆和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却一直在步步加强,手段也越来越阴险和凶狠。他们在保持军事威慑力量作后盾的前提下,一方面依靠其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优势为物质武器,大肆宣扬和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并以此作为诱感和威胁的资本;另一方面以西方意识形态为精神武装,加紧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渗透。美国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学家悉尼·胡克在他1959年出版的《政治权力与个人自由》一书中,力谏美国统治者为了不让共产主义取得胜利,应在保持和发展核“威慑力量”做后盾的前提下,“依靠教育的过程、范例的力量、自由观念的蔓延,以及西方巨大传统的文化渗透,逐渐去软化、去解放、去消磨世界上极权主义制度的边缘,直到他们自己的人民聚集他们的力量去推翻他们的统治者,建立起

一个自由的共和世界”。美国历届政府的反共人物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力量，他们以使共产党人“困惑”、“糊涂”、“思考”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证”。和青年人易于接受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来进行攻心战、宣传战，企图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争夺青年，培植、收买反对派和寻找代理人。《讲话》尖锐地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要领域。”“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我国的独立和主权，对我们的建设和改革，构成现实的威胁。”由此可见，提高和加强反和平演变的认识和斗争，是至关重要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政治观、价值观、人生观、历史观，作出有分析、有说服力的科学批判，而且这种批判必须着重针对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的具体观点，因为这些人正是西方敌对势力在我国进行颠覆活动的内应和代理人，而由于他们往往披着“爱国”的外衣，打着“关心”祖国前途的旗号，谈论的又往往是中国的现实问题，他们的谬论就有更大的蛊惑性，更易使缺乏历史知识和政治经验的青年上当受骗。我们高校教育工作者是为祖国培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园丁，是同国内外敌对势力争夺青年一代的战士。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依据《讲话》的精神，为“筑起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而奋斗不息。

注释：

- ①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页。
-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213页。
- ③ 参看《杜勒斯言论选辑》，知识出版社。

(上接第99页)

建立工业产权专门法院 处理商标等违法犯罪案件

近几年，商标违法犯罪案件数量巨大，但最终经由法院判决的案件为数寥寥。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则是一些地方人民法院懂商标业务的审判人员极其匮乏，加之其它民刑案件业务繁重，对商标侵权案件无暇或无力顾及，或者是由于司法处理手续繁琐、费日旷时，因而使商标被侵权方不愿诉诸法院，更愿把案件交由行政机关处理。

大量的商标侵权案件，特别是一些大案要案和触犯刑律的案件，最终由行政机关处理，不能说不存在很多的弊病，从长远看对于法制的完善，十分不利。比如，由于地方保护和行政干预，一些地方商标管理机关处理案件时，就很难作到公正和合理；由于一些地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缺乏相互协作和衔接，不少行政处理决定无法或不能及时得到法律强制，等等。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笔者认为需建立专门的工业产权法院，来受理有关商标违法犯罪案件，增强司法处理在商标侵权案件中的权威。

工业产权法院除了受理商标案件外，还应包括专利和制止不正当竞争、甚或版权方面的违法案件。我国《专利法》已于1985年正式实施，制止不正当竞争方面的法律也正在加紧制定中，这方面的诉讼案件今后会逐渐增多。先可以考虑在北京设立工业产权初审和终审法院，条件成熟后，再在上海、武汉等特大城市设立初审法院，所有案件的二审集中到北京。筹建之初，可以从有关部门、院校和司法机关抽调一批懂工业产权法律和技术，具有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同志，在短期培训之后，担任审判员。从长期看，则应集中在一两所院校系统地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充实审判员队伍。由于商标等工业产权案件的特殊性，在案件受理和判决的程序方面应当与民事案件处理程序有所不同，这些特殊的规定以及工业产权法院的地位、受案范围等，都需在《商标法》等工业产权法律里加以明确。